

資訊透明與財務操縱對非營利組織 捐贈收入影響之研究

林江亮*、何永智**

摘要

捐贈收入是影響非營利組織永續發展的關鍵，基於過去研究大都只考慮收入特性、費用特性與組織特性對非營利組織捐贈收入所產生的影響，至於探討資訊透明度與財務操縱程度對捐贈收入影響者則不多見。因此本文認為有必要在控制上述特性變數的前提下，探討資訊透明度及財務操縱程度與非營利組織捐贈收入之間的關聯，以使各界能更加了解影響非營利組織捐贈收入的因素。

實證結果發現，資訊透明度及財務操縱程度分別與捐贈收入呈正相關及負相關，顯示資訊透明度愈高及財務操縱程度愈低的組織，由於其誠信度較佳，故其所能獲得的捐贈收入較多。各項控制變數方面，上述特性變數皆顯著影響非營利組織之捐贈收入；個別控制變數中，各項費用變數及組織類型與捐贈收入呈正相關，而各項收入變數、設立年數及服務價格則與捐贈收入呈負相關。

本文除了提供捐贈收入會受資訊透明度與財務操縱程度影響的實證證據外，對於強化各界對於影響非營利組織捐款收入之理解，以及提醒非營利組織管理者提高資訊透明度與降低財務操縱程度有助於資金募集等，也都有相當程度的貢獻。

關鍵詞：資訊透明、財務操縱、捐贈收入、非營利組織

JEL 分類代號：C31, D83, L31, M41

* 私立中原大學會計學系教授兼非營利組織研究中心主任，本文聯繫作者。電話：(03)2655320，Email：cllincycu@yahoo.com.tw；cllin@cycu.edu.tw。

** 行政院主計處會計。

資訊透明與財務操縱對非營利組織 捐贈收入影響之研究

林江亮、何永智

壹、緒論

在環境快速變遷及社會價值多元化的時代，由於政府職能及市場機能已無法滿足各式各樣的社會需求，加上政府預算受限於議會的審核，而企業活動亦受制於股東對利潤的要求，造成非營利組織反而成為滿足現代社會多樣化需求的主要供給者，因此國內非營利組織的數量成長相當迅速¹。近年來由於國內經濟發展遲緩，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各類非營利組織已經開始面臨資源不足的問題，而非營利組織的成立皆各有其使命及目標，在本位主義的影響下，對有限資源的競逐已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故如何取得足夠的資源以達成組織的使命，儼然成為現代非營利組織必須共同面對的難題。

非營利組織的資源主要來自於捐贈收入 (包括捐款、捐助及募款收入等)、業務收入 (包括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附屬作業組織淨益、出版收入、義賣收入、學費及安置收入

¹ 從現行法律與命令的觀點來看，我國的非營利組織可以分為「法人」與「非法人」團體兩大類。「法人」團體包括財團法人與社團法人兩類；「非法人」團體則包括已立案非法人與未立案非法人兩類，只有社團法人及已立案非法人團體有逐年統計的官方資料。根據歷年來內政部內政統計年報顯示，不論是全國性或地域性的人民團體 (包括社團法人及已立案的非法人團體) 數量，皆呈現逐年成長的趨勢。全國性人民團體由 1977 年 789 家，逐年成長至 2007 年 8,210 家，地域性人民團體由 1979 年 7,243 家，逐年成長至 2007 年 31,819 家。

等)、補助收入(包括政府補助收入及機構補助款等)、專案及委辦收入、服務及會費收入與其他收入(包括利息收入、租金收入、處分利益收入、匯兌收入、股利收入等)。雖然業務與服務收入占非營利組織收入的比重有增加的趨勢，然而大部分的組織仍以捐贈及補助收入為其主要資金來源²。

由於捐贈收入是非營利組織的主要資金來源，因此為提昇社會大眾對非營利組織的認同及信任，以及協助捐款人瞭解非營利組織的運作狀況，並且鼓勵非營利組織承諾並實踐組織使命等，臺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於2005年10月21日宣告成立。該聯盟以責任信用(Accountability)及公開透明(Transparency)為理念，除了提供相關非營利組織的法規外，也提出會員的自律公約與規範，並要求其會員應對外公開自2004年起的財務報表及工作計劃。截至2007年為止，已有74家會員上網公開其相關資訊。立法規範方面，為有效管理勸募行為，妥善運用社會資源，以促進社會公益，保障捐款人權益，立法院於2006年4月25日通過「公益勸募條例」，為我國公益募款之管理樹立新的里程碑。在加強網路資訊揭露方面，行政院研考會自2007年起推出「網際營活獎」活動，該活動以專案經費補助優質的民間非營利網站，並透過「非營利組織共通作業網站」建置計劃，公開遴選50家非營利組織，提供免費的網站架構規劃、功能設計及翻譯英文網頁等服務，藉以協助非營利組織能提昇其網路資訊揭露程度。綜合以上，近年來不管是政府主管單位或民間自律機構，對於要求非營利組織應適當揭露其資訊之共識是相當明確的。

隨著科技的進步與創新，網際網路已成為相當普遍的工具，已有愈來愈多的組織選擇在網站上揭露其相關資訊。目前可以透過網際網路取得的資訊包括：組織介紹、經營資訊、財務狀況與服務成果等。此外隨著政府單位e化作業的推動，透過網路提高組織本身資訊公開的程度，已逐漸成為共識。以網際網路來揭露資訊，除了有降低資訊傳遞

² 以本文表2的樣本敘述統計量為例，經總資產加以平減後的捐贈收入平均數為0.432，高於經總資產加以平減後的商業收入(包括業務收入、專案及委辦收入與服務及會費收入)及補助收入的平均數，分別為0.242及0.254，故可得知捐贈收入仍是大多數非營利組織的主要資金來源。

成本及時間的優點外，也有擴大傳播對象及增加組織宣傳機會的好處。因此對於資源有限的非營利組織而言，若能將組織相關資訊揭露於網站以昭公信，其除了能有效節省募款費用並提昇社會大眾對組織的認同外，也可以增加組織的捐贈收入。

財務報導的主要目的，在於透過報表將組織的營運及財務資訊，有效的傳達給外部使用者。對於非營利組織而言，公開且迅速將資訊傳達給組織的捐贈者及補助者等利害關係人，是相當重要的任務。Healy and Wahlen (1999) 認為盈餘管理 (Earnings Management) 是指管理者在報導財務狀況或從事交易時，運用主觀判斷扭曲財務報表，以誤導某些利害關係人對公司經營結果之認知，或影響依賴會計數字為基礎的契約結果。Trussel (2003) 認為會計操縱 (Accounting Manipulation) 是指非營利機構的管理者意圖虛偽陳述其財務資訊，以較有利的方式來表達整體財務績效。由上可知，組織的管理者為了達到某種目的，可能會透過會計調整或窗飾等方式，以便某些財務數符合其需求，這種現象在營利事業通常稱之為盈餘管理，然而盈餘一詞在非營利組織中很少使用，因此本文將非營利組織的盈餘管理或會計操縱行為統稱為財務操縱 (Financial Manipulation)。

過去雖然有文獻探討過影響非營利組織捐贈收入的因素，然而其重點或著重於收入特性、費用特性與組織特性等因素 (林江亮與謝昶成，2007)，或著重於資訊透明度 (網站資訊揭露程度) 對捐贈收入之影響者 (林江亮，2009)，較少有人探討財務操縱程度對非營利組織捐贈收入之影響。因此本文擬以過去文獻探討過的收入特性、費用特性與組織特性為控制變數，探討資訊透明度與財務操縱程度等變數對我國非營利組織捐贈收入之影響。

貳、文獻探討

本節探討影響非營利組織捐贈收入因素之相關文獻，綜合過去關於此方面研究的內

容，本文將上述影響因素區分為資訊透明度、財務操縱程度、相關控制變數（包括收入特性、費用特性、組織特性）等構面，以下分別說明各項構面之相關文獻。

一、資訊透明度對非營利組織捐贈收入之影響

Jensen and Meckling (1976) 認為，由於擁有組織的主理人（指組織的擁有者）無法完全觀察代理人（指主理人所委任經營組織者）的行為，而代理人也無法讓主理人完全了解其能力，因此在雙方皆追求利潤極大化前提下，很容易產生道德危機（Moral Hazard）與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等代理問題。Beaver (1998)、Chen et al. (2003, 2004) 及 Petersen and Plenborg (2006) 也都認為，提高組織之資訊透明度，不但能提升組織內部管理者與外部利害關係人之溝通，也可減緩資訊不對稱所產生之代理問題。陳瑞斌與許崇源 (2008) 則認為資訊揭露具有治理的功能，增加資訊揭露水準可以降低管理當局與外部股東的資訊不對稱，並降低管理當局（或控制股東）潛在移轉企業資產的風險（代理風險）。

Olson (2000) 發現非營利組織之董事會規模、董事平均任期和董事長的商業背景，對於組織的績效有顯著的影響，因此認為非營利組織和營利組織一樣都存有代理問題，而資訊揭露為解決上述問題的良方之一。Herzlinger (1994) 以美國 1929 年經濟危機之經驗為證，認為非營利組織唯有公開其相關的財務與業務資訊，才能重拾社會大眾對該組織的信心。曾華源與張友馨 (2007) 及鄭惠文與彭文賢 (2007) 也認為資訊揭露除了能協助非營利組織降低其與使用者間資訊的不對稱外，更可以減少使用者的捐助風險，進而有吸引更多新資金和管理人才投入等優點。

Harvey and McCrohan (1988) 認為資訊揭露除了可使捐贈者瞭解捐款運用的方式外，也可使潛在捐贈者能充份瞭解該組織，並給予組織更正面的評價。陳玥君 (2008) 以我國的財團法人基金會為研究對象，認為基金會的資訊揭露程度應與其捐贈收入呈正向關係，實證結果雖與預期方向相同不過並不顯著。林江亮與李岫穎 (2008) 探討影響非營

利組織資訊揭露程度因素時發現，捐贈收入愈高的組織其資訊透明度也愈高，因此兩者之間呈現顯著的正向關聯。林江亮 (2009) 探討資訊透明度對捐贈收入影響時也發現，資訊透明度較高的組織，由於其較易獲得捐贈者的認同，故其捐贈收入相對較高。

池祥麟與陳培倫 (2004) 認為非營利組織可以透過財務報導，降低其與捐款者之間的資訊不對稱問題，故提高資訊透明度應有助於組織未來捐款收入的增加。Vesterlund (2003) 認為非營利組織採取宣告募款金額的策略，可以釋放出服務品質的相關訊息，捐款者通常會根據此訊息來決定是否捐款給該組織以及捐多少錢給該組織。上述宣告策略的成功，主要與捐款者與非營利組織之間存有資訊不對稱有關。一般而言，募款者瞭解自己的非營利組織是高服務品質或低服務品質者，但是一般社會大眾卻無法準確評估非營利組織的真實服務品質。

由以上文獻可知，資訊透明度除了可以有效緩和代理問題外，藉由將組織的財務及營運等相關資訊完整的傳達給社會大眾，可以有效提昇社會大眾對非營利組織的信任感，進而使組織獲得更多的捐贈資源，故非營利組織的資訊透明度大致會與其捐贈收入呈正向關聯。

二、財務操縱程度對非營利組織捐贈收入之影響

Leone and Van Horn (2005) 發現美國的非營利醫院有財務操縱行為，且其操縱的方式與營利醫院相似。Brickley and Van Horn (2002) 研究營利與非營利醫院執行長薪酬及職位週轉率對財務績效影響時發現，薪酬及職位週轉率確實與財務績效息息相關；此外非營利醫院之執行長職位週轉率與其財務績效的關聯性，顯著高於營利醫院。Eldenburg et al. (2004) 亦發現在營利及非營利醫院中，董事及執行長的週轉率和較差的財務績效有關。Elshafie (2007) 發現營利醫院比非營利醫院更積極從事財務操縱，當計入裁決性應計數前的盈餘較低時，醫院會更積極增加盈餘，反之則會降低盈餘。池祥麟與胡予瀨 (2008) 認為具有較低淨利、較高計劃費用率變動率、較高的計劃折舊費用、未透過市府來發行債

券及評等成績較佳等特徵的非營利組織，其從事財務操縱的機率較高。綜合上述文獻，非營利組織與營利組織相似，都會有財務操縱的現象，不過相對而言非營利組織進行財務操縱的程度低於同類型的營利組織。

Eldenburger et al. (2008) 認為非營利組織進行財務操縱的主要動機為降低舉債成本及維持或增加組織的捐贈收入，而營利組織則為提高盈餘。因此非營利組織與營利事業之財務操縱目的並不相同。Greenlee and Brown (1999)、Tinkelman (1999) 及 Weisbrod and Dominguez (1986) 等研究發現，捐贈者在進行捐贈決策時，通常會以組織計畫費用率的高低為依據，因為該數字愈高代表組織將資源投入於目的事業開支的程度愈大，因此為了獲得更多的捐贈收入，非營利組織會有向上操縱計畫費用率的誘因。Krishnan et al. (2006) 及 Keating et al. (2008) 研究也都認為，非營利組織為獲取捐款者的認同，會透過財務操縱的方式來提高其計畫費用率或降低其募款費用率。

由以上文獻可知，捐款人會依據計畫費用率等財務數據來決定其捐款金額，因此為了維持及增加捐贈收入，非營利組織的管理者會有進行財務操縱的動機。

三、相關控制變數對非營利組織捐贈收入之影響

由於過去探討影響非營利組織捐贈收入因素的相關文獻發現，收入特性、費用特性及組織特性等變數皆會影響捐款收入，因此本文將影響非營利組織捐贈收入因素的相關控制變數區分為收入特性變數、費用特性變數與組織特性變數，以下詳細說明各項特性變數之相關文獻。

(一)收入特性對非營利組織捐贈收入之影響

Posnett and Sandler (1989) 認為，非營利組織主要的收入來源包括捐贈收入、補助收入、商業收入 (Autonomous Income) 及其他收入 (例如基金孳息等)。由於我國非營利會計目前並無統一之會計科目，因此本文將所有出現在樣本收支決算表中的收入科目，以

上述之分類方式將其歸為四大類。其中捐贈收入包括來自社會大眾的捐款或捐助收入，以及舉辦籌募活動所獲得的募款收入等；補助收入包括接受由經政府核准補助之經費及其他機構（如聯合勸募協會）的機構補助款所產生之收入等；商業收入包括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附屬作業組織淨利、出版收入、義賣收入、學費及安置收入、專案及委辦收入、服務及會費收入等；其他收入則包括利息收入、租金收入、處分利益收入、匯兌收入、股利收入等。

由於其他收入的範圍太廣且各組織之間有極大的差異，加上其金額通常不大，故本文於探討影響捐贈收入之收入特性因素時將其排除，因此最後實際納入考慮的變數僅有商業收入及補助收入等變數。此外本文對於商業收入之定義也與國內過去研究不同，鄭如孜與李佩憶（2005）將商業收入定義為銷售貨品與服務收入及會費收入等，林江亮與李岫穎（2008）及林江亮（2009）之定義範圍雖稍為廣泛，不過也只涵蓋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附屬作業組織收入或淨利及出版收入等。本文認為非營利組織的商業收入除了應該包括上述研究之範圍外，義賣收入、學費及安置收入、專案及委辦收入等性質具有對價關係者，也應該歸類為商業收入。

商業收入對捐贈收入影響之文獻方面，DiMaggio（1986）認為非營利組織商業化的趨勢，可能會取代、轉移或破壞組織的聲譽及使命，進而影響捐款者的捐贈行為，故商業收入可能會間接對捐贈收入造成傷害。Bush（1992）、Weisbrod（1997）、Segal and Weisbrod（1998）、Froelich（1999）、鄭如孜與李佩憶（2005）及林江亮與謝昶成（2007）也都認為，商業收入與捐贈收入之間會產生排擠效果，因為非營利組織從事商業活動，可能會使組織忽略社會使命或降低對募款的投入，因而造成組織捐贈收入的減少。不過 Posnett and Sandler（1989）則發現，商業收入與捐贈收入呈顯著的正向關聯，因此兩者之間會產生互補效果。蕭盈潔（2002）也認為非營利組織之捐贈收入與商業收入存在著正向關係，因為商業化可將企業經營與管理的觀念帶入組織，讓組織的運作更有效率與效果，因此捐贈者會比較願意捐款給這類型的組織。

補助收入對捐贈收入影響之文獻方面，Smith（2003）及林江亮（2009）等認為，補助

款與私人捐贈間具有互補效果，故兩者之間會有顯著的正相關。因為補助者會扮演著對組織認證的角色，因此補助收入愈高的組織，其可能會使捐贈者認為組織獲得政府或其他機構的某種認可或保證，因此強化了民眾與企業對其捐贈的意願，故該類組織的捐贈收入也會愈高。Tinkelman (1999) 及鄭如孜與李佩憶 (2005) 則認為，補助收入對捐贈收入會有排擠效果，故兩者之間會有顯著的負相關。而 Posnett and Sandler (1989)、Callen (1994)、Brooks (1999)、Okten and Weisbrod (2000) 及 Borgonovi and O'Hare (2004) 等研究皆認為，非營利組織之補助收入與捐贈收入間，並沒有顯著的關係存在。此外 Brooks (2000) 指出補助收入與捐贈收入間，應同時存在排擠效果與互補效果，故兩者之間呈現倒 U 形的關係。換言之，當補助收入在較低水準時會刺激私人捐贈，當補助收入超過一定程度時則會排擠私人捐贈。張文俊與鄒佳穎 (2006) 及林江亮與謝昶成 (2007) 亦認為補助收入與捐贈收入間，同時存在排擠效果與互補效果，但兩者之間則呈現 U 形關係，而非倒 U 形的關係。

綜合上述文獻，商業收入可能與捐贈收入呈正相關或者負相關；補助收入與捐贈收入之間的關係則更分歧，認為兩者之間呈現正相關、負相關及無相關者皆有，亦有研究者認為兩者之間應為非線性關係（先負後正之 U 型或先正後負之倒 U 型）。雖然各文獻所認知的方向並不一致，不過大致而言捐贈收入確實會受商業收入及補助收入的影響。

(二)費用特性對非營利組織捐贈收入之影響

美國的非營利組織通常會將總費用區分為計劃功能 (Program Function) 與支援功能 (Support Function) 兩類，前者指組織執行專案計劃服務的費用，後者則包括行政管理費用與募款費用；我國的非營利組織則將總費用細分為業務費用、辦公費用、人事費用及其他費用，故此兩地對費用的分類方式不太相同。大致來說，美國的計劃功能費用（或稱為計劃費用）類似於我國的業務費用，支援功能費用（行政管理費用與募款費用）則相當於我國的辦公費用、人事費用與其他費用。

Kingma (1995) 認為當非營利組織將所獲得之捐贈，多數都用於其所被賦予的社會公

益使命 (計劃功能) 時, 捐贈者較會捐款給該類非營利組織; 反之若非營利組織執行計劃功能的費用愈低, 或執行支援功能的費用愈高時, 其捐贈收入會比較少。換言之, 計劃功能費用與行政管理及募款等支援功能費用, 分別與捐贈收入呈顯著的正向及負向關聯。

在支援功能費用中的募款費用方面, Weisbrod and Dominguez (1986)、Steinberg (1986)、Posnett and Sandler (1989) 及 Tinkelman (1999) 等研究皆認為, 非營利組織之募款費用顯著與其捐贈收入呈正相關。因為募款費用愈高, 代表組織投入宣傳的資金與活動愈多, 因此組織較能將訊息傳達給捐贈者, 並且讓捐贈者更加瞭解組織, 因此組織所獲取的捐款也就愈多。Callen (1994) 進一步認為當募款費用做為廣告費用的代理效果時, 也發現其與捐贈收入呈正相關; 但募款費用過高時, 捐贈收入反而會因服務價格的提高而減少。總之過去文獻認為募款費用會顯著影響捐款收入, 然而由於募款費用在我國目前並無法透過財務報表等公開管道取得, 加上非營利組織通常也沒有彙總募款費用的習慣, 因此有關非營利組織募款費用對於捐款收入影響之實證研究, 目前無法以我國的資料進行驗證。

目前我國的非營利會計並無統一之會計科目, 因此本文將所有出現在樣本收支決算表中的費用科目, 依多數組織之分類習慣將其區分為業務費用、辦公費用、人事費用及其他費用等四大類。其中業務費用包括義賣品成本、銷貨成本、會刊編製印刷費、附屬作業組織損失、專案計劃支出、委辦支出、業務推展費、活動費、業務費、其他業務費、會議費、上級團體會費、繳納其他團體會費、捐助費、扶助費及廣告費等; 辦公費用包括財產保險費、租金費、印刷費、郵電費、差旅費、修繕費、水電費、文具書報費、交際費、運費、管理費、勞務費、辦公費、購置費、折舊、折耗、消耗品、雜項購置及其他費用等; 人事費用包括員工薪給、退休金、伙食費、加班費、交通費、保險補助費、訓練費、職工福利及人事費等; 其他費用則包括利息支出、處分投資或固定資產損失、固定資產報廢損失、預備金、提撥基金及分類錯誤支出等。

由於其他費用的範圍太廣且各組織之間有極大的差異, 加上其金額通常不大, 故本文於探討影響捐贈收入之費用特性因素時將其排除, 因此最後實際納入考慮的變數包括

業務費用、辦公費用及人事費用等變數。此外本文對於業務費用之定義也與國內過去研究不同，林江亮與謝昶成 (2007) 將業務費用定義為捐助費用及專案支出業務費，林江亮與李岫穎 (2008) 則將其定義為銷貨成本、委辦支出、業務推展及服務費等。本文則認為非營利組織的業務費用，除了應該包括上述研究所列出之項目外，義賣品成本、會刊之編製印刷費、附屬作業組織損失、專案計劃支出成本、其他業務費、會議費、上級團體會費、繳納其他團體會費、捐助費、扶助費及廣告費等也應列入業務費用之範圍。

各項費用與捐贈收入之相關文獻方面，林江亮與謝昶成 (2007) 發現業務費用與捐贈收入呈現正相關，該文認為我國的業務費用相當於美國的計劃功能費用，而相關國外文獻的實證證據也顯示，計劃功能費用與捐贈收入呈顯著的正相關，因此業務費用自然也會與捐贈收入呈正相關。此外林江亮與謝昶成 (2007) 及林江亮 (2009) 探討費用特性變數對捐贈收入之影響時發現，由於辦公費用的高低，可能代表組織於募款時可投入資源的多寡，因此辦公費用愈高則代表投入募款的資源愈多，故能帶給非營利組織的捐贈收入也就愈高。林惠貞 (2003) 認為非營利組織的人事費支出太高，將有礙公益活動之推動，加上捐贈者通常會希望其員工秉持服務精神，不宜領取過高的薪水，因此人事費用愈高，捐贈者的捐款意願相對較低。林江亮 (2009) 則發現人事費用與捐贈收入呈顯著正相關，該文認為由於我國非營利組織的人事費用，其細項包括部份的行政管理費用與部份的募款費用，前者與捐贈收入呈負相關而後者則與捐贈收入呈正相關，因此在我國的研究中當人事費用中募款費用的比重較高時，人事費用會與捐贈收入呈正相關；反之若人事費用中行政管理費用的比重愈高時，人事費用則會與捐贈收入呈負相關。

綜合上述文獻，以美國的分類方式來看，計劃功能費用與捐贈收入呈正向關聯，支援功能費用 (特別是其中的行政管理費用) 與捐贈收入呈負相關，而支援功能中的募款費用可能與捐贈收入呈正相關或非線性關係。若以我國的分類方式來看，業務費用與辦公費用會與捐贈收入呈正向關聯，而人事費用與捐贈收入之關聯方向則不太一致。

(三)組織特性對非營利組織捐贈收入之影響

根據過去相關文獻的實證結果，本文將影響捐贈收入的組織特性變數區分為：組織類型（是否為社會福利及慈善性質組織）、設立年數及服務價格等³，以下分別說明上述各項變數與捐贈收入關聯之相關文獻。

組織類型（是否為社會福利及慈善性質組織）方面，陸宛蘋（2006）認為由於社會服務組織是非營利組織中能見度最高者，此類組織除了倡導能力特別強外，同時也特別重視與政府組織、營利組織及社會大眾之間的互動，故其通常會較其他類型的非營利組織獲得更多的捐款。林江亮與謝昶成（2007）及林江亮（2009）亦發現屬社會服務慈善性質之非營利組織，其捐贈收入相對較高，不過結果並不顯著。鄭如孜與李佩憶（2005）則發現，在非營利組織中，屬社會服務慈善性質之捐贈收入最低，其次為文化教育藝術性質之組織，其他性質組織之捐贈收入則顯著高於前兩者。

設立年數方面，Weisbrod and Dominguez（1986）主張在缺少更多關於非營利組織的財貨及服務的品質資訊下，組織的成立年數可以做為其聲譽及服務品質的代理變數。Posnett and Sandler（1989）及Tinkelman（1999）等發現，非營利組織的設立年數與其收到的捐贈收入呈顯著的正相關，顯示設立年數較長的非營利組織，可能會因為其知名度較高而較易得到捐贈者的信賴，故其捐贈收入會比較多。Callen（1994）、鄭如孜與李佩憶（2005）及林江亮與謝昶成（2007）也認為非營利組織的設立年數，應與其捐贈收入呈正向關係，不過其實證結果皆呈現不顯著的關聯。陳玥君（2008）預期設立年數與捐贈收入之間應呈現正向關係，不過實證結果卻顯示兩者呈現顯著的負向關係。

³ Callen（1994）認為，非營利組織的志工投入小時數會與捐贈收入呈顯著的正向關聯，不過我國目前並未將其揭露於財務報表，而多數組織也沒有詳細統計其志工投入小時數，因此本文無法將其納入研究。

服務價格方面，Weisbrod and Dominguez (1986)、Posnett and Sandler (1989)、Callen (1994)、Tinkelman (1999)、Okten and Weisbrod (2000) 及林江亮 (2009) 等研究皆認為，服務價格會與捐贈收入呈顯著的負向關聯。因為服務價格愈高，通常代表組織將捐贈用於非營利服務的比率較低，意即非營利組織運用捐贈的效率較差，故捐贈者可能會降低其捐款意願，進而造成非營利組織捐贈收入的減少。

綜合上述文獻，組織類型 (是否為社會福利及慈善性質組織) 與捐贈收入之間的關係並不一致，認為呈正相關及負相關者皆有。設立年數與捐贈收入之關聯也不一致，認為呈正相關、負相關及無顯著相關者皆有；至於服務價格與捐贈收入之關聯，多數文獻大致認為應呈現負向相關。

參、研究方法

本節說明本文的研究方法，內容包括資訊透明度的衡量、財務操縱程度的衡量、研究假說、實證模式、變數定義、研究期間、研究樣本與資料分析方法等，詳細說明如下：

一、資訊透明度的衡量

由緒論得知，政府獎勵非營利組織透過網路提高組織本身資訊公開的程度，並提供許多網站揭露的範本供非營利組織參考，而民間公益團體自律聯盟亦定期在網站上公開所屬會員的年度財報及工作報告，所以透過網路媒介來以提高組織的資訊透明度，已成為政府及民間團體的共識。此外我國尚無定期評估非營利組織資訊揭露程度的專屬機構，加上目前也無權威機構建立適當的資訊揭露指標或資料庫可供研究之用。因此透過過去相關文獻之建議來建立衡量資訊揭露程度的指標，並透過非營利組織之相關網站來驗證其是否揭露上述資訊項目，本文認為是當前衡量非營利組織資訊透明度的較可行方

式。

許崇源 (2001) 認為非營利組織應該公開的資訊項目，至少應包括組織目標與架構、會務報告、財務年度決算報表、捐款人名冊及金額、年度預算、重要員工及契約廠商名單與支付金額、服務對象之基本資料、重大資本支出、重要轉投資及關係人交易、組織之營運策略與績效等項目。徐淑娟 (2004) 也認為非營利組織之組織資訊與財務收支是其公開的重點，至於應該公開的詳細資訊項目，至少應包括組織目標與架構，定期會務報告、年度決算報表、捐款明細、組織重要成員、經營決策與服務成效等。

林江亮與李岫穎 (2008) 以修改證券基金會所公佈之「第四屆資訊揭露評鑑指標」並加入其獨特見解的方式，界定非營利組織應揭露的資訊內容。在刪除明顯不適用於非營利組織的項目後，該文將其他適合的指標重新以非營利組織之特性加以詮釋，並納入募款等非營利組織專屬的活動資訊揭露項目後，將網站資訊揭露指標區分為組織基本資訊、財務及營運資訊、董 (理) 監事會與業務主管資訊等三部份，合計 60 項指標。

考量資訊透明度衡量指標涵蓋範圍的完整性及嚴謹度，本文於建立非營利組織資訊揭露衡量指標時，除納入上述文獻所提出之項目外，並將參酌證券基金會所公佈之「第六屆資訊揭露評鑑指標」所建議之新項目，同時也納入作者認為非營利組織所必須揭露的項目，詳細之篩選過程說明如下。首先本文採納了許崇源 (2001) 與徐淑娟 (2004) 所建議之大部分指標，不過契約廠商名單與支付金額、重大資本支出、重要轉投資及關係人交易等指標，由於不常出現於非營利組織的相關活動中，加上目前幾乎無非營利組織加以揭露，故本文於建立衡量指標時加以刪除。其次林江亮與李岫穎 (2008) 所提出的 60 項指標中，由於某些項目區分的太詳細且幾乎都沒有組織加以揭露 (特別是董監事相關訊息)，因此本文將其合併為 34 項指標。再者本文則加入證券基金會所公佈之「第六屆資訊揭露評鑑指標」所新增之相關會議開會資訊、事業趨勢概況討論、財務報表包含附註或明細表、相關活動之照片或影音檔等 4 項指標。最後則納入本文所建議的執行長或主管參與進修情形、志工相關資訊等 2 項指標，合計共 40 項指標。計算個別組織之整體資訊揭露程度時，是以該組織於相關網站中揭露資訊之指標項目數除以 40 且乘以 100

後，再依其排序後的百分位數作為其衡量值⁴。

本文將上述 40 項指標歸類為：基本資訊、董 (理) 事會或會員 (會員代表) 大會資訊、執行長與主管資訊、員工與志工資訊、治理資訊、經營資訊、營運及財務狀況資訊及其他資訊等八大範圍。各類資訊所包含的項目，詳細說明如下。

基本資訊包括是否揭露組織之設立年數或發展沿革、宗旨或願景、組織架構 (如主管之設置、職稱及權責等)、組織章程、所在地與聯絡方式或分支機構等 5 項指標。董 (理) 事會或會員 (會員代表) 大會資訊包括是否揭露董 (理) 事會或會員 (會員代表) 大會開會資訊、董 (理) 事或會員 (會員代表) 出席董 (理) 事會之開會狀況、董 (理) 事會或會員 (會員代表) 大會之議事錄或決議事項、董 (理) 事之相關資料 (至少必須有成員名單，其他如學經歷、加入董 (理) 事會時間、目前兼任該組織及其他組織之職務、相關費用、異動情形等)、董 (理) 事及監察人參與進修訓練之情況等 5 項指標。

執行長與主管資訊包括是否揭露執行 (秘書) 長之相關資料 (至少必須有姓名，其他如學經歷、起聘時間、相關酬金等)、主管相關資訊 (至少必須有成員名單，其他如學經歷、目前兼任其他組織職務、薪資及獎金、異動情形等)、執行長或主管參與進修訓練之情況等 3 項指標。員工與志工資訊包括是否揭露員工相關資訊 (至少必須有員工總人數，其他如職位、薪資及獎金、福利制度與勞資關係等)、員工參與進修訓練之情況、志工相關資訊 (如總人數、總時數、參與活動情形、訓練等) 等 3 項指標。

治理資訊包括是否揭露經營團隊對財務及營運之檢討、組織治理狀況之討論、內部稽核之組織及運作、風險管理之政策等 4 項指標。經營資訊包括是否揭露總體經濟環境及所屬事業的趨勢概況討論、關於組織之各種報導、與其他組織之競爭或合作情形、組織之相關活動訊息、內部財務或營運之相關作業程序、各業務服務之詳細情況 (如內容、範圍、服務量及成果等)、歷史績效指標 (如計劃費用率、服務價格…等)、業務發展計劃、募款方式、捐款人相關資訊 (如金額、明細或主要捐款人名冊) 等 10 項指標。

⁴ 參考林江亮與李岫穎 (2008) 及林江亮 (2009) 之作法。

營運及財務狀況資訊包括是否揭露工作報告或預算書表、財務狀況報表 (至少包括資產負債表或淨資產表)、業務績效報表 (至少包括營運表或收支餘絀表)、經執業會計師查核或核閱、包含附註或明細表、重要契約的主要內容與訴訟或非訟事件等訊息等 6 項指標。其他資訊則包括是否有英文 (或其他外文) 版本、建置問題回答功能、相關活動之照片或影音檔、設置相關連結等 4 項指標。

二、財務操縱程度的衡量

本文參考 Trussel (2003) 所建立用以判斷潛在財務操縱者及衡量財務操縱機率的兩階段模型，做為衡量財務操縱程度的依據。由於上述文獻將財務操縱衡量的方法擴展至非營利領域，其估計方式除了不同於營利事業用於衡量盈餘管理之方法外，該模式同時也具統計上的顯著性，故本文認為其較適合用於評估非營利組織的財務操縱程度⁵。

如文獻所述，因為捐贈者在進行捐贈決策時會考慮計劃費用率，故非營利組織會有高估此一比率的誘因。Trussel (2003) 認為若組織的計劃費用率顯著高於預期時，該組織應被視為潛在財務操縱者。經適當修改後，本文將以下列模式來判斷潛在的財務操縱者⁶：

$$BEXP/TR = \beta_0 + \beta_1 LOG(TA) + \beta_2 OFFEXP/TR + \beta_3 PAYEXP/TR + \beta_4 IND + \varepsilon \quad (1)$$

⁵ 池祥麟與胡予瀕 (2008) 探討財務操縱與評等成績關聯性時，亦採用此法評估非營利組織的財務操縱程度。

⁶ 在 Trussel (2003) 的模式中，因變數為經總費用平減後之計劃費用，自變數則包括專業募款費用佔總費用比率、總募款費用佔捐贈收入的比率、規模變數與組織類型變數。如文獻探討所述，我國與美國對於費用分類之方式有所差異，加上用總費用平減可能會有線性重合的問題，故本文以經總收入平減後之業務費用替代經總費用平減後之計劃費用，而以經總收入平減後之辦公費用及人事費用替代專業募款費用佔總費用比率及總募款費用佔捐贈收入的比率。

其中 $BEXP/TR$ 為經總收入平減後之業務費用， $LOG(TA)$ 為總資產取自然對數， $OFFEXP/TR$ 為經總收入平減後之辦公費用， $PAYEXP/TR$ 為經總收入平減後之人事費用， IND 為區分樣本是否為社會服務及慈善團體之虛擬變數，若是其值為 1，其餘為 0。

依照 Beneish (1997) 及 Trussel (2003) 的做法，在 10% 的信賴水準下，若非營利組織的正向預期標準誤 (誤差項/迴歸標準差) 顯著大於 0 時，表示該組織的計劃費用率顯著高於預期，因此該組織屬於潛在財務操縱者，而其他組織則屬非潛在操縱者。

在判斷出潛在財務操縱者後，本文緊接著以 Trussel (2003) 之模式來衡量各組織的財務操縱程度。該模式認為有六項財務特性會影響非營利組織的財務操縱程度，詳細說明如下：

$$FMD = \beta_0 + \beta_1 MARGIN + \beta_2 DEFEXP + \beta_3 GROWTH + \beta_4 DEPPROG + \beta_5 DEFREV + \beta_6 PROGCHG + \varepsilon \quad (2)$$

其中 FMD 即為根據 (1) 式所求得的是否為潛在財務操縱者的虛擬變數，若該組織為潛在財務操縱者則其值為 1，否則其值為 0； $MARGIN$ 為淨利 (即收入減去費用) 除以總收入； $DEFEXP$ 為遞延費用率，指遞延費用除以總資產； $GROWTH$ 為收入成長率，指本期收入與前期收入之差額，再除以前期收入後之比率； $DEPPROG$ 為業務折舊率指經固定資產與業務折舊費用合計數平減後之業務折舊費用； $DEFREV$ 為遞延收入率，指遞延收入除以總資產； $PROGCHG$ 為業務費用變動率，指本期之業務費用變動率除以前期之業務費用率。

本文以全部樣本估計出 (2) 式之各項參數後，再將個別樣本六項變數之實際值帶回估計後之 (2) 式，並以推算出的因變數之值 (Z 值) 做為各樣本財務操縱程度 (FM) 的衡量變數。上述數值愈大，代表進行財務操縱的程度愈高。

三、研究假說與實證模式

(一)資訊透明度對捐贈收入影響之研究假說

由於資訊透明度提高時，可以減少組織與捐贈者或潛在捐贈者之間的資訊不對稱，進而可以降低組織管理者因自利所造成的代理問題，因此本文推論資訊透明度會與捐贈收入呈顯著的正向關係，而文獻探討中亦發現資訊透明度大致與捐贈收入呈現正相關 (Harvey and McCrohan, 1988; 陳玥君, 2008; 林江亮與李岫穎, 2008; 林江亮, 2009)，故本文建立以下之研究假說 (H1)。

H1：資訊透明度變數與非營利組織之捐贈收入呈正相關。

(二)財務操縱程度對捐贈收入影響之研究假說

非營利組織也有財務操縱的情形 (Eldenburg et al., 2004; Elshafie, 2007)，特別是為維持或增加捐贈收入時，非營利組織會從事財務操縱的行為 (Eldenburg et al., 2008)，而其財務操縱的方式通常是透過提高計劃費用率的方式來進行 (Greenlee and Brown, 1999; Tinkelman, 1999; Weisbrod and Dominguez, 1986)。本文因此推論財務操縱程度會與捐贈收入呈負相關，並且建立以下之研究假說 (H2)。

H2：財務操縱程度變數與非營利組織之捐贈收入呈負相關。

(三)實證模式

本文將以下列實證模式來驗證前述研究假說 (H1 及 H2) 是否成立：

$$DR = \beta_0 + \beta_1 DIS + \beta_2 FM + \beta_3 BR + \beta_4 GR + \beta_5 BE + \beta_6 OFF + \beta_7 PAY + \beta_8 IND \\ + \beta_9 AGE + \beta_{10} SP + \varepsilon \quad (3)$$

為控制組織規模效果之影響，因此上述模式中之各項收入及費用變數，本文皆以經總資產平減後的數值來進行實證。因此模式中之 DR 為經總資產平減後的捐贈收入， DIS 為資訊透明度變數， FM 為財務操縱程度變數。控制變數方面， BR 為經總資產平減後的商業收入， GR 為經總資產平減後的補助收入， BE 為經總資產平減後的業務費用， OFF 為經總資產平減後的辦公費用， PAY 則為經總資產平減後的人事費用。此外 IND 為組織類型之虛擬變數， AGE 為設立年數變數， SP 為服務價格變數⁷，各變數之詳細定義請參考表 1。

⁷ Callen (1994) 將服務價格定義為：對捐款者而言為了增加一元慈善產出所必須投入的成本，計算公式為總費用除以非募款與行政管理費用，即 [總費用 / (總費用 - 募款費用 - 行政管理費用)]。然而由於的臺灣非營利組織，大多數都沒有在財務報表中揭露募款費用資訊，因此上述定義方式在臺灣並無法使用。本文認為各項費用中，除業務費用之外，其餘費用皆屬與慈善產出較無相關的募款與行政管理費用，因此本文將服務價格之計算公式修正為總費用除以業務費用 (總費用 / 業務費用)。

表 1 各變數之名稱與定義表

變數	名稱	定義
<i>DR</i>	捐贈收入	經總資產平減後之捐贈收入，捐贈收入包括捐款、捐助及募款收入等。
<i>DIS</i>	資訊透明度	以組織於網站中揭露資訊之指標項目數除以 40 並乘以 100 後，再將其排序後的百分位數作為其衡量值。
<i>FM</i>	財務操縱程度	以 Trussel (2003) 之兩階段模式所衡量之財務操縱程度 (<i>Z</i> 值)。
<i>BR</i>	商業收入	經總資產平減後之商業收入，商業收入包括銷貨收入、附屬作業組織淨利、出版收入、義賣收入、學費及安置收入、專案收入、委辦收入、服務收入及會費收入等。
<i>GR</i>	補助收入	經總資產平減後之補助收入，補助收入包括政府補助及機構補助等。
<i>BE</i>	業務費用	經總資產平減後之業務費用，業務費用包括義賣品成本、銷貨成本、會刊編印費、附屬作業組織損失、專案計劃支出、委辦支出、業務推展及活動費、業務費、其他業務費、會議費、上級團體會費、繳納其他團體會費、捐助費、扶助費及廣告費等。
<i>OFF</i>	辦公費用	經總資產平減後之辦公費用，辦公費用包括財產保險費、租金費、印刷費、郵電費、差旅費、修繕費、水電費、文具書報費、交際費、運費、管理費、勞務費、辦公費、購置費、折舊、折耗、消耗品、雜項購置及其他費用等。
<i>PAY</i>	人事費用	經總資產平減後之人事費用，人事費用包括員工薪給、退休金、伙食費、加班費、交通費、保險補助費、訓練費、職工福利及人事費等。
<i>IND</i>	組織類型	當組織屬社會福利及慈善服務團體時其值為 1，否則其值為 0。
<i>AGE</i>	設立年數	組織成立至 2007 年底的年數，計算至日為止。
<i>SP</i>	服務價格	以總費用除以業務費用替代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研究樣本及期間

研究期間方面，由於目前非營利組織之財務報表資訊揭露，大都只涵蓋營運及財務狀況資訊，至於基本資訊、董(理)事會或會員(會員代表)大會資訊、執行長與主管資訊、員工與志工資訊、治理資訊、經營資訊及其他資訊等則大都揭露於其網站上，因此本文同時以財務報表及網路資訊來衡量非營利組織的資訊透明度。雖然各家非營利組織大致都有揭露2004年至2007年的財務報表，不過由於本文主要的資訊是來自於網站，而網站資訊又只能取得某一時點之資料而已，至於以前年度之網站資訊並無法取得，故本文參考林江亮與李岫穎(2008)之作法，只取一年為研究期間，並以2008年8月31日做為衡量資訊透明度之基準日。至於本文之財務操縱程度、收入特性、費用特性及組織特性等變數，由於公布時程較晚，故皆為2007年年底之數據。

研究樣本方面，由於「臺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為我國目前最健全的民間非營利組織自律機構，加上該聯盟會要求其會員，基於責任信用與公開透明的理念，必須定期公開其財務報表與工作計劃。考量該聯盟成員的類型多樣性與比例代表性，加上進行實證時所需之資料該聯盟成員大都有提供，因此本文選擇以該聯盟之會員為研究樣本。

截至2008年8月底為止，該聯盟共計有87家會員，扣除相關財報資料不公開之13個樣本，以及財務資料不完整或有缺漏以致無法算出財務操縱程度之29個樣本後，本文實際納入研究之樣本數為45家。其中社會福利及慈善服務性質團體有31家，包括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等；非社會福利及慈善服務性質團體有14家，包括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建弘文教基金會等。

五、資料分析方法

本文所使用的資料分析方法包括：敘述性統計分析、相關性分析、迴歸分析與係數

檢定等。敘述性統計分析的主要工作為列出實證研究中各項變數之平均數、標準差、中位數、最小值、最大值與變異係數等，藉以了解各研究變數之基本特性。各項變數之間的相關性分析，目的在於了解各變數間之關聯性及是否存有共線性之問題。迴歸分析與係數檢定方面，由於迴歸分析隱含許多假設，因此有必要進行相關計量問題之檢驗與調整，以確保模式所獲得結論之正確性。這些檢定至少包括：模式適合度 (fitness)、異質變異數 (heteroskedasticity) 與共線性 (multicollinearity) 檢定等。

模式適合度方面，本文以 F 檢定為主、 AIC 與 SC 值為輔，來測試實證模式之適合度。異質變異數檢定方面，本文所計算各迴歸式之統計值係以 White (1980) 所提出之方式修正變異數後而得。共線性檢定方面，各變數間是否有共線性問題，本文係採變異數膨脹因子係數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 來檢定⁸。係數檢定方面，本文以 Wald 檢定來進行聯合係數檢定，以測試實證模式中各類特性所屬變數之係數是否不全為零；單一係數則以 t 檢定來進行，以測試實證模式中各類特性所屬變數之個別係數是否有顯著影響力。

肆、實證結果分析

本節說明經控制收入特性、費用特性、組織特性等影響後，資訊透明度及財務操縱程度對非營利組織捐贈收入影響之實證結果，內容包括敘述統計量分析、相關係數分析、各項研究假說之實證結果、敏感度分析等，詳細說明如下：

一、敘述統計量與相關係數分析

由於納入實證之各項變數中，多數都有落在 3 個標準差範圍以外的情形，因此這些

⁸ Neter et al. (1996) 認為個別變數的 VIF 值若小於 10，則表示其無嚴重的共線性問題。

變數有明顯的極端值存在，在進行相關實證分析前必須加以妥善處理⁹。

表2為經極端值處理後，各項變數之敘述統計量，由表中可知本文所採用之非營利組織樣本中，捐贈收入 (*DR*) 平均數為0.432。財務操縱程度 (*FM*) 與資訊透明度 (*DIS*) 之平均則分別為0.090及0.565。

表2 各變數之敘述統計量

變數	名稱	平均數	中位數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變異係數
<i>DR</i>	捐贈收入	0.432	0.358	0.419	1.642	0.001	0.970
<i>DIS</i>	資訊透明度	0.565	0.616	0.259	0.976	0.116	0.458
<i>FM</i>	財務操縱程度	0.090	0.085	0.128	0.328	-0.168	1.422
<i>BR</i>	商業收入	0.242	0.094	0.370	1.495	0.000	1.529
<i>GR</i>	補助收入	0.254	0.040	0.567	2.766	0.000	2.232
<i>BE</i>	業務費用	0.536	0.336	0.626	3.371	0.003	1.168
<i>OFF</i>	辦公費用	0.103	0.065	0.130	0.596	0.000	1.262
<i>PAY</i>	人事費用	0.241	0.145	0.325	1.478	0.000	1.349
<i>IND</i>	組織類型	0.689	1.000	0.468	1.000	0.000	0.679
<i>AGE</i>	設立年數	17.320	14.175	12.228	57.742	5.217	0.706
<i>SP</i>	服務價格	2.487	1.496	2.115	8.908	1.000	0.85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⁹ 本研究採用縮尾調整 (winsorizing) 的方式，將大於95%之值視為95%，小於5%之值視為5%，以刪除極端值對於影響實證結果的問題。

控制變數方面，收入與費用特性中，商業收入 (*BR*) 及補助收入 (*GR*) 之平均數分別為 0.242 與 0.254，人事費用 (*PAY*)、辦公費用 (*OFF*) 及業務費用 (*BE*) 之平均數分別為 0.241、0.103 及 0.536。組織特性中，組織類型 (*IND*) 之平均數為 0.689，表示樣本中屬社會福利及慈善服務性質者占總樣本的 70% 左右；至於設立年數 (*AGE*) 及服務價格 (*SP*) 之平均數則分別為 17.32 年及 2.487 倍。此外由補助收入、商業收入及財務操縱程度的變異係數較高可知，這些變數的離散程度較大；相對而言，資訊透明度、組織類型及設立年數等變數的變異係數較低，因此其離散程度亦較小。

表 3 為各實證變數之間的相關係數表，本文分別列出各變數之間的 Pearson 及 Spearman 相關係數。相關係數分析的旨在於協助瞭解因變數與自變數之間的關係，以及初步判斷各項自變數間，是否存有共線性的問題。若各項自變數之間的相關係數過高時，則可能隱含有共線性問題。從該表可知，初步看來捐款收入 (因變數) 與補助收入、各項費用變數與設立年數等自變數有顯著關聯。自變數之間的相關係數方面，從表 3 可知各自變數之間的 Pearson 相關係數都低於 0.6；而且除了辦公費用與人事費用的相關係數高於 0.7 之外，其餘自變數之間的 Spearman 相關係數也大都低於 0.6。

綜合以上，不管是從 Pearson 係數或者 Spearman 相關係數來看，初步而言各項自變數之間並無嚴重的共線性問題。不過為求慎重起見，本文於進行後續實證分析時，將另以 VIF 值來檢定共線性問題，以確保參數估計之正確性。

二、各項變數對捐贈收入影響之實證結果

從表 4 可以看出，(3) 式進行實證後其調整後判定係數 (*Adj. R²*) 為 0.882，*F* 值則為 33.960 (其 *p* 值趨近於 0)，因此該模式至少有一變數的係數是不為零。換言之，本文之資訊透明度、財務操縱程度及相關控制變數 (收入特性、費用特性、組織特性等變數)，至少會有一個變數會影響非營利組織之捐贈收入。

表 3

表 4 各項特性變數對捐贈收入影響之實證結果

變數	名稱	預期方向	係數	t 值	VIF 值
截距項			0.205	2.881 ***	
<i>DIS</i>	資訊透明度	+	0.124	1.728 *	1.376
<i>FM</i>	財務操縱程度	-	-0.767	-2.891 ***	1.243
<i>BR</i>	商業收入	?	-0.899	-8.936 ***	3.312
<i>GR</i>	補助收入	?	-0.724	-9.148 ***	8.115
<i>BE</i>	業務費用	+	0.753	15.547 ***	7.259
<i>OFF</i>	辦公費用	+	1.304	6.767 ***	4.020
<i>PAY</i>	人事費用	?	0.785	7.058 ***	6.712
<i>IND</i>	組織類型	?	0.091	1.627	1.203
<i>AGE</i>	設立年數	?	-0.004	-2.329 **	1.276
<i>SP</i>	服務價格	-	-0.034	-2.722 **	1.601
R^2				0.909	
$Adj R^2$				0.882	
AIC^c				-0.832	
SC^c				-0.390	
F 值				33.960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從表中可知，各項自變數之 *VIF* 皆小於 10，因此並無嚴重的共線性問題存在。表中的 *t* 值皆為經 White (1980) 修正後的統計值。***、**、* 則分別表示達 0.01、0.05 與 0.10 的顯著水準。此外 *AIC* (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on) 及 *SC* (Schwarz criterion) 值較小者，表示其模式較佳。

(一) 資訊透明度與財務操縱程度對捐贈收入影響之實證結果

從表 4 可知，在 0.10 的顯著水準下，資訊透明度 (*DIS*) 與捐贈收入 (*DR*) 呈顯著正相關，故本文之研究假說 1 (H1) 可以獲得支持，即資訊透明度會顯著影響非營利組織的捐贈收入。由於資訊透明度較高的組織，通常較能減少組織與捐贈者或潛在捐贈者之間

的資訊不對稱，從而降低組織管理者因自利所造成的代理問題，故其與捐贈收入之間會有顯著的正向關聯。此外在 0.01 的顯著水準下，財務操縱程度變數 (*FM*) 則與捐贈收入 (*DR*) 呈顯著負相關，故本文之研究假說 2 (H2) 亦可獲得支持，即財務操縱程度會顯著影響非營利組織的捐贈收入。通常財務操縱程度愈高者，縱然其財務績效可能較佳，不過其會引發捐贈者等外界人士的負面觀感，反而會使組織的捐贈收入下降。

(二)相關控制變數對捐贈收入影響之實證結果

表 4 之實證結果顯示，收入特性方面，在 0.01 的顯著水準下，商業收入 (*BR*) 與補助收入 (*GR*) 皆與捐贈收入 (*DR*) 呈顯著的負相關。由於商業收入愈高時，捐贈者可能會認為該組織有偏離使命的嫌疑，或者認為組織並沒有將資源用在組織目標活動上，因而會降低捐款給該組織的意願。此外當組織之補助收入愈高時，捐贈者可能會認為其已由政府或其他機構獲得足夠的資源，因而造成捐款人捐贈意願下降，故補助收入會對捐贈收入產生排擠效果。

費用特性方面，實證結果顯示，在 0.01 的顯著水準下，業務費用 (*BE*)、辦公費用 (*OFF*) 與人事費用 (*PAY*) 皆與捐贈收入 (*DR*) 呈顯著的正相關。業務費用愈高代表投入組織服務目的事業上的資源愈多，而傳達給捐贈者的正向訊息也就愈強烈，故組織獲得的捐贈收入愈多。人事費用與辦公費用愈高，可能代表組織投入於募款等相關活動的資源愈多，因此組織獲得的捐贈收入也就愈多。

組織特性方面，實證結果顯示，在 0.05 的顯著水準下，設立年數 (*AGE*) 與服務價格 (*SP*) 皆與捐贈收入呈顯著的負向關聯，然而組織類型 (*IND*) 與捐贈收入呈正向關聯，不過並不顯著。設立年數與捐贈收入呈顯著負相關，顯示隨著設立年數的增加，組織經總資產平減後的捐贈收入愈低。因為設立年數愈久的組織，通常也愈有能力透過捐贈以外的收入來募集資金，故相對於非捐贈收入而言，捐贈收入占總收入或總資產的比率，反而會因為非捐款收入增加的幅度大於捐贈收入增加的幅度而降低，因此經平減後的捐贈收入會與設立年數呈負相關。至於服務價格愈高，代表組織將捐贈用於目的事業

活動的比率較低，意即其運用捐贈的效率較差，故捐贈者會降低其捐款意願進而造成捐贈收入的減少。

表 5 各項變數對捐贈收入影響之 Wald 聯合係數檢定結果

	代理問題		收入特性		費用特性		組織特性	
	統計量	<i>p</i> 值	統計量	<i>p</i> 值	統計量	<i>p</i> 值	統計量	<i>p</i> 值
<i>F</i> 值	4.269	0.022 **	42.490	0.000 ***	186.264	0.000 ***	3.468	0.027 **
卡方值	8.538	0.014 **	84.980	0.000 ***	558.792	0.000 ***	10.403	0.015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分別表示達 0.01、0.05 與 0.10 的顯著水準。

(三)聯合係數檢定之實證結果

由於財務操縱程度與資訊透明度，都可被視為代理問題的替代變數，因此本文擬以 Wald 聯合係數檢定，檢視財務操縱程度與資訊透明度等代理問題變數對捐贈收入的影響。表 5 之檢定結果顯示，上述變數之 *F* 值為 4.2689 (*p* 值為 0.0222)，因此在 0.05 的顯著水準下，財務操縱程度與資訊透明度等代理問題變數，確實會顯著影響非營利組織的捐贈收入。

控制變數方面，本文也將以 Wald 聯合係數檢定來驗證收入特性、費用特性及組織特性等變數，是否會顯著影響非營利組織之捐款收入。表 5 之實證結果顯示，在 0.05 的顯著水準下，收入特性 (其 *F* 值為 42.4899，*p* 值則趨近於 0)、費用特性 (其 *F* 值為 186.2639，*p* 值則趨近於 0) 及組織特性 (其 *F* 值為 3.4677，*p* 值為 0.0267)，至少都會有某些個別變數會顯著影響非營利組織之捐款收入。

三、敏感性測試

本小節為敏感性分析，內容包括考慮補助收入與捐贈收入之非線性關係、將財務操

縱程度改以百分位數衡量、改以是否有附屬作業組織做為組織分類之衡量方式、辦公費用與人事費用之間相關係數過高之處理、採用似無相關迴歸法 (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消除捐贈收入、資訊透明度與財務操縱程度變數之間的內生性影響等。若上述測試的結果皆與先前的結論一致，則表示本文的實證結論是具有強韌性的，詳細內容說明如下。

表 6 考慮補助收入與捐贈收入非線性關係之敏感性分析結果

變數	名稱	預期方向	係數	t 值	VIF 值
截距項			0.203	2.736 ***	
<i>DIS</i>	資訊透明度	+	0.126	1.724 *	1.38
<i>FM</i>	財務操縱程度	-	-0.762	-2.796 ***	1.252
<i>BR</i>	商業收入	?	-0.897	-8.751 ***	3.32
<i>GR</i>	補助收入	?	-0.736	-9.388 ***	9.316
<i>GR</i> ²	補助收入平方項	?	1.59×10^{-8}	0.492	2.309
<i>BE</i>	業務費用	+	0.752	15.205 ***	7.271
<i>OFF</i>	辦公費用	+	1.321	6.611 ***	4.129
<i>PAY</i>	人事費用	?	0.781	6.834 ***	6.746
<i>IND</i>	組織類型	?	0.092	1.63	1.206
<i>AGE</i>	設立年數	?	-0.004	-2.303 **	1.276
<i>SP</i>	服務價格	-	-0.035	-2.708 **	1.626
<i>R</i> ²				0.909	
<i>Adj R</i> ²				0.879	
<i>AIC</i> ^c				-0.79	
<i>SC</i> ^c				-0.308	
<i>F</i> 值				30.051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從表中可知，各項自變數之 *VIF* 皆小於 10，因此並無嚴重的共線性問題存在。表中的 *t* 值皆為經 White (1980) 修正後的統計值。***、**、* 則分別表示達 0.01、0.05 與 0.10 的顯著水準。此外 *AIC* (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on) 及 *SC* (Schwarz criterion) 值較小者，表示其模式較佳。

(一)考慮補助收入與捐贈收入之非線性關係

由於過去文獻中，Brooks (2000)、張文俊與鄒佳穎 (2006) 及林江亮與謝昶成 (2007) 研究皆認為，補助收入與捐贈收入間應該同時有排擠及互補效果，故兩者之間呈現非線性關係。由於本文先前之實證結果，並未考慮上述補助收入與捐贈收入之間的非線性關係，因此本小節擬將經總資產平減後之補助收入平方項 (GR^2) 加入迴歸模式中，並重新進行實證分析。

從表 6 之結果顯示，上述補助收入的平方項並未與捐贈收入呈顯著的關係，而且其他變數與捐贈收入之間的關聯，也大致與表 4 相同。因此在本文的樣本中，補助收入與捐贈收入大致呈線性關係，而加入補助收入平方項後，其結論仍與先前所發現者一致。

(二)財務操縱程度改以百分位數衡量

由於之前進行迴歸分析時，財務操縱程度是以參考 Trussel (2003) 之模式所算出之 Z 值來替代之，不過為避免 Z 值過度集中於某一範圍，本文將仿照先前對於資訊透明度之衡量方式，將其值依大小重新排序後，以其百分位數作為財務操縱程度的新衡量值 (FMP)。從表 7 之結果顯示，在 0.05 的顯著水準下，改以百分位數衡量之財務操縱程度仍與捐贈收入呈顯著的負相關；資訊透明度與捐贈收入仍呈正相關，不過在 0.10 的水準下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性；至於其他控制變數與捐贈收入之間的關聯，皆與表 4 相同。因此在本文的樣本中，改以重新排序後之百分位數來衡量財務操縱程度，對本文先前實證所獲得結論之影響並不大。

表 7 之資訊透明度與捐贈收入呈不顯著正相關的理由，本文認為可能與資訊透明度、財務操縱程度及捐贈收入三者間，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有關。因此本文先前以普通最小平方法所進行估計與檢定所獲得的結論，可能會產生嚴重的偏誤。故本文後續將另聯立方程的方式重新進行實證，在消除上述變數之間內生性問題的影響後，重新檢視資訊透明度與財務操縱程度對捐贈收入的影響。

表7 財務操縱程度改以百分位數衡量之敏感性分析結果

變數	名稱	預期方向	係數	t 值	VIF 值
截距項			0.280	2.835 ***	
<i>DIS</i>	資訊透明度	+	0.115	1.510	1.472
<i>FMP</i>	財務操縱程度	-	-0.289	-2.721 **	1.392
<i>BR</i>	商業收入	?	-0.902	-8.331 ***	3.358
<i>GR</i>	補助收入	?	-0.722	-8.381 ***	8.207
<i>BE</i>	業務費用	+	0.759	13.912 ***	7.272
<i>OFF</i>	辦公費用	+	1.324	6.432 ***	4.144
<i>PAY</i>	人事費用	?	0.760	6.696 ***	6.601
<i>IND</i>	組織類型	?	0.092	1.559	1.181
<i>AGE</i>	設立年數	?	-0.005	-2.206 **	1.301
<i>SP</i>	服務價格	-	-0.030	-2.471 **	1.662
R^2				0.899	
<i>Adj R</i> ²				0.869	
<i>AIC</i> ^c				-0.728	
<i>SC</i> ^c				-0.287	
<i>F</i> 值				30.286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從表中可知，各項自變數之 *VIF* 皆小於 10，因此並無嚴重的共線性問題存在。表中的 *t* 值皆為經 White (1980) 修正後的統計值。***、**、* 則分別表示達 0.01、0.05 與 0.10 的顯著水準。此外 *AIC* (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on) 及 *SC* (Schwarz criterion) 值較小者，表示其模式較佳。

(三)改以是否有附屬作業組織做為組織分類之衡量方式

本研究先前參考相關文獻之作法，以是否為社會福利及慈善服務團體做為區分組織類型之方式。不過由於非營利組織中，有些組織有附屬作業組織，有些組織則無附屬作業組織。有附屬作業組織者會通常有銷售貨物或勞務之行爲，而產生的盈餘可用於完成組織之成立目的。無附屬作業組織者由於欠缺自創性收入，故通常必須依賴外界捐助才能完成組織之成立目的。換言之，有無附屬作業組織，會顯著影響非營利組織之財務運作方式，因此本文將另以是否有附屬作業組織 (*AFF*)，取代先前之是否為社會福利及慈善服務團體，做為衡量組織分類之替代變數，藉以提昇本文結論之說服力。

從表 8 之結果顯示，改以是否有附屬作業組織做為組織分類方式後，在 0.10 的顯著水準下，除了資訊透明度與捐贈收入之間的正相關變為不顯著，以及組織分類變數由原來的不顯著變為顯著負相關外，其他變數與捐贈收入之間的關聯皆與表 4 相同。上述結果顯示，有附屬作業組織者因為有其他財源之故，因此其捐贈收入占總資產之比率顯著低於無附屬作業組織者。不過即使以是否有附屬作業組織來做為組織分類之替代變數，確實比用是否為社會福利及慈善服務團體來衡量更好，不過其並不影響本文先前之實證結論。此外上述資訊透明度與捐贈收入呈不顯著正相關的理由，本文認為可能與資訊透明度、財務操縱程度及捐贈收入三者間，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有關。故本文後續將另聯立方程的方式重新進行實證，在消除上述變數之間內生性問題的影響後，重新檢視資訊透明度與財務操縱程度對捐贈收入的影響。

表8 改以是否有附屬作業組織做為組織分類方式之敏感性分析結果

變數	名稱	預期方向	係數	t值	VIF值
截距項			0.269	2.933 ***	
<i>DIS</i>	資訊透明度	+	0.098	1.504	1.414
<i>FM</i>	財務操縱程度	-	-0.722	-2.718 **	1.214
<i>BR</i>	業務收入	?	-0.907	-7.829 ***	3.318
<i>GR</i>	補助收入	?	-0.706	-8.178 ***	8.926
<i>BE</i>	業務費用	+	0.749	12.263 ***	8.019
<i>OFF</i>	辦公費用	+	1.347	6.791 ***	4.123
<i>PAY</i>	人事費用	?	0.801	6.209 ***	6.732
<i>AFF</i>	組織分類	?	-0.083	-1.880 *	1.357
<i>AGE</i>	設立年數	?	-0.004	-2.145 **	1.256
<i>SP</i>	服務價格	-	-0.034	-2.754 ***	1.688
R^2				0.903	
<i>Adj R</i> ²				0.874	
<i>AIC</i>				-0.766	
<i>SC</i>				-0.324	
<i>F</i> 值				31.573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從表中可知，各項自變數之 *VIF* 皆小於 10，因此並無嚴重的共線性問題存在。表中的 *t* 值皆為經 White (1980) 修正後的統計值。***、**、* 則分別表示達 0.01、0.05 與 0.10 的顯著水準。此外 *AIC* (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on) 及 *SC* (Schwarz criterion) 值較小者，表示其模式較佳。

(四)辦公費用與人事費用之間相關係數過高之處理

由於表 3 之結果顯示，在辦公費用與人事費用的 Spearman 相關係數高於 0.7，雖然從 *VIF* 值來看並無嚴重的共線性問題，不過為確保參數估計之穩定性與正確性，本文將刪除人事費用並重新進行實證，以避免將變數內容相似的辦公費用與人事費用，重複放入模式中所可能造成的偏誤。

表 9 之實證結果顯示，刪除人事費用變數後，在 0.10 的顯著水準下，除了資訊透明度與捐贈收入之間的正相關變為不顯著外，其他變數與捐贈收入之間的關聯皆與表 4 相同。上述資訊透明度與捐贈收入呈不顯著正相關的理由，本文認為可能與資訊透明度、財務操縱程度及捐贈收入三者間，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有關。故本文後續將另聯立方程的方式重新進行實證，在消除上述變數之間內生性問題的影響後，重新檢視資訊透明度與財務操縱程度對捐贈收入的影響。

(五)採用似無相關迴歸法

由於先前的文獻中有研究發現，捐贈收入增加會導致非營利組織揭露更多的資訊，因為捐贈收入較高的組織，基於維繫捐款者的信賴與認同藉以獲取未來更多的捐贈，因此會提高其資訊揭露程度 (林江亮與李岫穎, 2008)。此外張瑞當與方俊儒 (2006) 發現，在資訊揭露評鑑系統實施後，企業盈餘管理行為已顯著降低，其中又以管理當局持股比率較高的企業，受此系統的影響較為明顯。Lobo and Zhou (2001) 及 Hunton et al. (2006) 也認為公司透明度不高時，經理人會認為盈餘操弄的行為較不會被查覺，進行盈餘管理會對公司股價有提升的效果，且較不會有損其誠實報導盈餘的聲譽。換言之，企業在資訊揭露度或是透明度越高的情況下，經理人越沒有意願進行盈餘管理。

表9 處理辦公費用與人事費用之間相關係數過高之敏感性分析結果

變數	名稱	預期方向	係數	t 值	VIF 值
截距項			0.167	1.780 *	
<i>DIS</i>	資訊透明度	+	0.208	1.678	1.328
<i>FM</i>	財務操縱程度	-	-0.643	-2.216 **	1.217
<i>BR</i>	業務收入	?	-0.596	-5.175 ***	2.017
<i>GR</i>	補助收入	?	-0.341	-6.509 ***	3.285
<i>BE</i>	業務費用	+	0.474	11.463 ***	4.101
<i>OFF</i>	辦公費用	+	2.371	8.697 ***	2.051
<i>IND</i>	組織分類	?	0.119	1.586	1.185
<i>AGE</i>	設立年數	?	-0.005	-2.271 **	1.267
<i>SP</i>	服務價格	-	-0.021	-1.694 *	1.526
R^2				0.854	
<i>Adj R</i> ²				0.816	
<i>AIC</i>				-0.402	
<i>SC</i>				-1.41×10^{-4}	
<i>F</i> 值				22.696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從表中可知，各項自變數之 *VIF* 皆小於 10，因此並無嚴重的共線性問題存在。表中的 *t* 值皆為經 White (1980) 修正後的統計值。***、**、* 則分別表示達 0.01、0.05 與 0.10 的顯著水準。此外 *AIC* (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on) 及 *SC* (Schwarz criterion) 值較小者，表示其模式較佳。

綜合上述文獻之結論，財務操縱程度與資訊透明度之間確實互有關聯。由於本文先前的推論認為提昇資訊揭露程度會導致非營利組織的捐贈收入增加，因為資訊透明度較高之組織，由於較能減少捐款人或潛在捐款人間的資訊不對稱，進而降低組織管理者因自利所造成的代理問題，因此資訊透明度的提昇可以使捐贈收入增加。從以上觀點及結論看來，非營利組織之資訊揭露程度與捐贈收入間，以及財務操縱程度與資訊透明度間，都有可能都會相互影響，故三者應存在內生性的問題。

此外本文先前之實證結果，在 0.10 的顯著水準下，除了表 4 與表 6 顯示資訊揭露程度與捐贈收入呈顯著的正相關外，表 7 至表 9 的敏感度分析中皆顯示兩者雖呈正相關，不過顯著水準都略高於 0.10，因此資訊揭露程度與捐贈收入之間的正相關並不穩定。本文認為上述資訊揭露程度與捐贈收入呈不顯著關聯之情形，也可能與捐贈收入、資訊揭露程度及財務操縱程度之間的內生性問題有關。

基於上述理由，加上本文先前以普通最小平方法所進行估計與檢定所獲得的結論，可能會產生嚴重的偏誤，故本文將另以似無相關迴歸法重新進行實證，藉以消除上述變數之間的內生性問題。進行似無相關迴歸時，本文使用以下之聯立方程式：

$$DR = \beta_0 + \beta_1 BR + \beta_2 GR + \beta_3 BE + \beta_4 OFF + \beta_5 PAY + \beta_6 IND + \beta_7 AGE + \beta_8 SP + \beta_9 DIS + \beta_{10} FM + \varepsilon \quad (4)$$

$$DIS = \beta_0 + \beta_1 FM + \beta_2 BR + \beta_3 GR + \beta_4 PAY + \beta_5 OFF + \beta_6 BE + \beta_7 IND + \beta_8 AGE + \beta_9 SP + \beta_{10} DR + \varepsilon \quad (5)$$

$$FM = \beta_0 + \beta_1 DIS + \beta_2 BR + \beta_3 GR + \beta_4 PAY + \beta_5 OFF + \beta_6 BE + \beta_7 IND + \beta_8 AGE + \beta_9 SP + \beta_{10} DR + \varepsilon \quad (6)$$

表 10 為採用似無相關迴歸法探討影響非營利組織捐贈收入因素之實證結果，從表中之捐贈收入模式可知，考慮捐贈收入、資訊透明度與財務操縱程度之間的內生性問題後，各特性變數與捐贈收入之間的關聯性皆有顯著提昇，而組織類型與捐贈收入之正向關聯，也由原來的不顯著變為顯著。在 0.01 的顯著水準下，資訊透明度、各項費用變數及組織類型等變數皆與捐贈收入呈顯著正相關，至於財務操縱程度、各項收入變數、設立年數及服務價格等變數則都與捐贈收入呈顯著負相關，故結果大致與表 4 相同。

表 10

在捐贈收入模式中，資訊透明度與財務操縱程度皆會顯著影響捐贈收入。從資訊透明度模式與財務操縱程度模式也可以看出，財務操縱程度與捐贈收入也會顯著影響資訊透明度，而對於資訊透明度與捐贈收入也會顯著影響財務操縱程度，因此捐贈收入、資訊透明度與財務操縱程度三者之間確實互為彼此之內生變數。大致而言，捐贈收入與資訊透明度之間互為正向影響，捐贈收入與財務操縱程度之間互為負向影響，而資訊透明度與財務操縱程度之間則互為正向影響。

此外由表 10 可知，捐贈收入模式之判定係數 (R^2) 與調整後判定係數 ($Adj R^2$) 分別為 0.894 及 0.863，由於在 0.01 的水準下，資訊透明度、財務操縱程度與各項控制變數都能顯著解釋捐款收入，因此其調整後判定係數之下降幅度較小。至於資訊透明度模式與財務操縱程度模式，兩者調整後判定係數都有大幅下降的情況，前者由 0.276 降為 0.063，而後者雖然降幅較小也由 0.384 降為 0.202，顯示上述模式中所納入的變數並非全部都能顯著解釋其因變數。

就資訊透明度模式而言，在 0.05 的顯著水準下，除了捐贈收入、辦公費用及設立年數能合理解釋資訊透明度外，其餘變數對於資訊透明度的解釋力都不顯著。就財務操縱程度模式，在 0.01 的顯著水準下，設立年數與資訊透明度對於財務操縱程度的解釋力也不理想。因此資訊透明度模式與財務操縱程度模式相對而言，其調整後判定係數下降之幅度會高於捐款收入模式調整後判定係數之下降幅度。

綜合以上敏感性分析的結果顯示，不論是考慮補助收入與捐贈收入之非線性關係、將財務操縱程度改以百分位數衡量、改以是否有附屬作業組織做為組織分類之衡量方式、辦公費用與人事費用之間相關係數過高之處理、採用似無相關迴歸法進行測試等，實證結果大致與先前所獲得的結論相似，故本文的實證結果應具有強韌性。

伍、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臺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之會員為對象，經控制收入特性、費用特性及組織特性等變數後，探討資訊透明度與財務操縱程度對非營利組織捐贈收入之影響。相關的研究結論、建議與限制說明如下：

一、研究結論

資訊透明度方面，實證結果顯示其會顯著影響非營利組織的捐贈收入，故研究假說 1 (H1) 可以獲得支持。即資訊透明度較高的組織，由於其資訊透明度較高，以致能減少組織與捐贈者或潛在捐贈者之間的資訊不對稱，從而可降低組織管理者因自利所造成的代理問題，故其與捐贈收入之間會有顯著的正向關聯。財務操縱程度方面，實證結果顯示其會顯著影響非營利組織的捐贈收入，故研究假說 2 (H2) 可以獲得支持。即財務操縱程度越高的組織，通常愈容易引起捐贈者或潛在捐贈者的負面觀感，故其與捐贈收入之間會有顯著的負向關聯。

控制變數方面，實證結果顯示收入特性、費用特性及組織特性皆會顯著影響非營利組織的捐贈收入。個別控制變數中，商業收入與補助收入皆與捐贈收入呈顯著負相關，可能是因為捐贈者基於其違背使命或資源已經充裕的理由，減少對這類組織的捐贈，故其捐贈收入佔所有收入來源的比例有所下降。人事費用、辦公費用與業務費用皆與捐贈收入呈顯著正相關，因為這些費用愈高的組織，代表其所投入之物力與人力愈多，因此能夠募集到比較多的資金，故其捐贈收入也會較高。設立年數變數與捐贈收入呈顯著的負向關聯，可能是組織成立時間越長，收入來源的種類及型式越多，因此捐贈收入佔所有收入來源的比例有所下降。此外服務價格亦與捐贈收入呈顯著的負向關聯，顯示服務價格愈高的組織，由於其將捐贈用於非營利服務的比率愈低，而且其運用捐贈的效率也較差，故捐贈者會降低其捐贈意願，進而造成組織捐贈收入的減少。

敏感度分析顯示，大致而言，上述結果並不受補助收入與捐贈收入可能為非線性關係、財務操縱程度改以百分位數衡量、改以是否有附屬作業組織做為組織分類之衡量方式、辦公費用與人事費用之間相關係數過高之處理、以似無相關迴歸法進行聯立方程式檢驗等情境的影響，因此本文之結論應具有強韌性。

二、研究建議與限制

研究建議方面，本文的資料期限僅有一年，故採用普通最小平方法來從事實證研究並獲得本文的結論，但隨著政府對於非營利組織資訊透明度的重視，以及政府依據「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特別條例」發放消費券後，公益團體自律聯盟對於將消費券捐給財務透明合法組織的倡導，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非營利組織提高其資訊揭露程度及公布其財務報表。故建議未來的研究，可累積多期研究樣本的資料，並採用固定效果或隨機效果模型，以檢驗本文的結論是否會因為橫斷面資料具有差異性，導致估計的結果產生偏誤。此外若資料允許的話也可以採因果關係檢定來進行研究，探討財務操縱程度、資訊透明度及捐贈收入間，究竟誰為領先因素，誰為落後因素，是彼此相互影響或是完全無關。

研究限制方面，由於絕大多數的非營利組織，目前皆未對外揭露其財務相關資訊，因此本文的資料來源為臺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會員所公布的財務報表資料，因此本文之研究結論可能會產生選擇性偏誤 (selection bias)，加上所公布的財務報表中，又會有不完整及資料缺漏的問題，因此本文的有效樣本數只有 45 個，隨著要求非營利組織財務透明的聲浪日益高漲，故本文建議未來應提高研究樣本的範圍與數量，以使研究的結果更具可靠性。

此外由於募款費用之資訊目前尚難取得，因此即使諸多國外研究皆指出該變數對捐贈收入有顯著的正面影響，本文亦無法加以驗證。當然本文所採用之服務價格計算方式，也因募款費用無法直接取得而必須改以其他方式來計算，故未來非營利組織之財務報表若有揭露募款費用時，建議相關的研究應驗證其與捐贈收入之關聯，並使用該變數來計

算服務價格。

最後由於臺灣目前並未針對非營利組織建立專屬的資訊評鑑指標，外部亦無專責的評等機構，對非營利組織資訊揭露的程度進行評比，因此本文係參考先前文獻及證劵基金會之第六屆資訊揭露評鑑指標，做為本文資訊透明度指標的依據，不過由於此種方式仍存在不夠客觀，以致可能造成許多會影響研究結論的缺失。若未來能建立具有客觀性及可靠性的資訊揭露標準，或是有外部專責評等機構的評等分數可供參考時，相信本文所獲得的結論將能更加正確。

(收件日期為民國98年4月1日，接受日期為民國98年12月3日)

參考文獻

(1)中文部分

1. 池祥麟與陳培倫，2004，「美國非營利組織收益管理行為之分析」，第三部門學刊，2：25-57。
2. 池祥麟與胡予瀨，2008，「非營利組織會計操縱與評等成績關聯性之分析-以美國非營利組織為例」，臺灣社會福利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45-257。
3. 林江亮，2009，「資訊透明度對捐款收入影響之實證研究」，經濟研究，45：65-102。
4. 林江亮與李岫穎，2008，「影響非營利組織網站資訊揭露程度之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0：327-356。
5. 林江亮與謝昶成，2007，「臺灣非營利組織捐款收入影響因素之實證研究」，第三部門學刊，7：45-71。
6. 林惠貞，2003，「我國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與監督制度之研究」，國立臺北師範學

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7. 徐淑娟，2004，「非營利組織捐款人對組織財務透明度重要性認知對捐款行為影響之實證研究」，私立中國文化大學會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8. 張文俊與鄒佳穎，2006，「政府文化藝術補助與私人捐贈關係之研究—以臺灣表演藝術團體為例」，財稅研究，38：38-51。
9. 張瑞當與方俊儒，2006，「資訊揭露評鑑系統對企業盈餘管理行為之影響」，會計評論，42：1-22。
10. 陳玥君，2008，「非營利組織資訊揭露之影響因素」，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11. 許崇源，2001，「我國非營利組織責任及透明度提昇之研究—德爾菲法之應用」，中山管理評論，9：540-566。
12. 陸宛蘋，2006，「臺灣非營利組織治理原則之探討—以社會福利基金會為例」，國立政治大學經營管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3. 陳瑞斌與許崇源，2008，「資訊揭露水準對於權益資金成本之影響」，東吳經濟商學學報，61：67-108。
14. 曾華源與張友馨，2007，「財務管理是非營利組織募款責信之基礎」，社區發展季刊，118：121-141。
15. 鄭如孜與李佩憶，2005，「非營利組織商業活動對捐款收入之影響」，第三部門學刊，3：81-106。
16. 鄭惠文與彭文賢，2007，「非營利組織財務資訊的公開報導：美國經驗與其意涵」，行政暨政策學報，44：1-42。
17. 蕭盈潔，2002，「非營利組織之事業化—以社會福利機構為例」，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2)英文部分

1. Beaver, W. H., 1998, *Financial Reporting: An Accounting Revolution*,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2. Beneish, M. D., 1997, "Detecting GAAP Violation: Implications for Assessing Earnings Management Among Firms with Extreme Financial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16:271-309.
3. Borgonovi, F. and M. O'Hare, 2004, "The Impact of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ional and Sectoral Effects on Private Funding,"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28:21-36.
4. Brickley, J. A. and R. L. Van Horn, 2002, "Managerial Incentives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Evidence from Hospital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45:227-250.
5. Brooks, A. C., 1999, "Do Public Subsidies Leverage Private Philanthropy for the Arts? Empirical Evidence on Symphony Orchestras,"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8:32-45.
6. Brooks, A. C., 2000, "Public Subsidies and Charitable Giving: Crowding Out, Crowding In, or Both?"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19:451-464.
7. Bush, R., 1992, "Survival of the Nonprofit Spirit in a For-Profit World,"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1:391-410.
8. Callen, J. L., 1994, "Money Donations, Volunteering and Organizational Efficiency," *The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5:215-228.
9. Chen, K. C., W., Z. Chen, and K. C. J. Wei, 2003, "Disclosure,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Evidence from Asia's Emerging Markets," *SSRN Working Paper*.
10. Chen, K. C., W., Z. H. Chen, and K. C. J. Wei, 2004, "Disclosure,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in Emerging Markets," *SSRN Working Paper*.
11. DiMaggio, P. J. 1986, "Can Culture Survive the Marketplace?" in P.J. DiMaggio, ed., *Nonprofit Enterprises in the Arts: Studies in Missions and Constraints*, Oxford University

- Press, New York.
12. Eldenburg, L., B. E. Hermalin, M. S. Weisbach, and M. Wosinska, 2004, "Governance, Performance Objectives and Organizational Form: Evidence from Hospitals,"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10:527-548.
 13. Eldenburg, L., K. Gunny, K. Hee, and N. Soderstrom, 2008, "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 Evidence from Nonprofit Hospitals,"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14. Elshafie, E., 2007, "A Comparison of Earnings Management between Not-for-profit and For-profit Hospitals," *SSRN Working Paper*.
 15. Froelich, K. A., 1999, "Diversification of Revenue Strategies: Evolving Resource Dependence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8: 246-268.
 16. Greenlee, J. S. and K. L. Brown, 1999, "The Impact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on Contributions to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Research in Accounting Regulation*, 13: 111-125.
 17. Harvey, J. W. and K. F. McCrohan, 1988, "Strategic Issues for Charities and Philanthropies," *Long Range Planning*, 21:44-55.
 18. Healy, P. M. and J. M. Wahlen, 1999, "A Review of the Earnings Management Literatur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tandard Setting," *Accounting Horizons*, 13:365-383.
 19. Herzlinger, R. E., 1994, "Effective Oversight: A Guide for Nonprofit Director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2:52-60.
 20. Hunton, J. E., R. Libby and C. L. Mazza, 2006, "Financial Reporting Transparency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The Accounting Review*, 81:135-157.
 21. Jensen, M. C. and W. H. Meckling, 1976,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305-360.
 22. Keating, K. E., M. L. Parsons, and A. A. Roberts, 2008, "Misreporting Fundraising: How Do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ccount for Telemarketing Campaigns?" *The Accounting Review*, 83:417-446.
 23. Kingma, B. R., 1995, "Do Profit Crowd Out Donations, or Vice Versa? The Impact of

- Revenue from Sales on Donations at the American Red Cross,” *Nonprofit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6:21-38.
24. Krishnan, R., M. H. Yetman, and R. J. Yetman, 2006, ”Expense Misreporting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The Accounting Review*, 81:399-420.
25. Leone, A. J. and R. L. Van Horn, 2005, “How do Nonprofit Hospitals Manage Earnings?”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4:815-837.
26. Lobo, G. and J. Zhou, 2001, “Disclosure Quality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Economics*, 8:1-20.
27. Neter, J. M. H. Kutner, C. J. Nachtsheim., and W. Wasserman, 1996, *Applied Linear Statistical Models*, 4th ed, Chicago: Irwin.
28. Okten, C. and B. A. Weisbrod, 2000, “Determinants of Donations in Private Nonprofit Market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75:255-272.
29. Olson, D. E., 2000, “Agency Theory in the Not-for-profit Sector: Its Role at Independent College,”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9:280-296.
30. Petersen, C. and T. Plenborg, 2006, “Voluntary Disclosure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 Denmark.”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Auditing and Taxation* 15:127-149.
31. Posnett, J. and T. Sandler, 1989, “Demand for Charity in Private Non-profit Markets: The Case of the U. K.,”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40:187-200.
32. Segal, L.M. and B. A. Weisbrod, 1998, “Interdependence of Commercial and Donative Revenues,” in B. A. Weisbrod, ed., *To Profit or Not to Profit: The Commerci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33. Smith, T. M., 2003, “The Effect of NEA Grants on the Contributions to Nonprofit Dance Companies,” *Journal of Arts Management, Law and Society*, 33:98-113.
34. Steinberg, R., 1986, “Should Donors Care about Fundraising,” in S. Rose-ackerman, ed., *The Economics of Nonprofit Institutions: Studies in Structure and Poli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35. Tinkelman, D., 1999,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Donations to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an Efficiency Ratio,” *Research in Government and Nonprofit Accounting*, 10:135-161.

36. Trussel, J., 2003, "Assessing Potential Accounting Manipulation: the Financial Characteristics of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with Higher than Expected Program-spending Ratios,"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32:616-634.
37. Vesterlund, L., 2003, "The Informational Value of Sequential Fundraising,"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7:627-657.
38. Weisbrod, B. A., 1997, "The Future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Its Entwining with Private Enterprise and Government,"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16:541-555.
39. Weisbrod, B. A. and N. D. Dominguez, 1986, "Demand for Collective Goods in Private Nonprofit Markets: Can Fundraising Expenditures Help Overcome Free-rider Behavior?"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30:83-96.
40. White, H., 1980, "A Heteroskedasticity-consistent Covariance Matrix Estimator and a Direct Test for Heteroskedasticity," *Econometrica*, 48:817-838.

Implications of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and Financial Manipulation on Donations: Empirical Evidences from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Chiang-Liang Lin* and Yung-Chih Ho**

Abstract

Donation revenue (DR) is the key factor for the perpetual development of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s (NPOs). Prior papers only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of revenue characteristics, expense characteristics, and organ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n donations, the effect of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DIS) and financial manipulation (FM) are neglected. In order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influential determinants of DR, we control the effect of characteristics mentioned above and then explore the implications of DIS and FM on DR.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DIS and FM respectively hav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sociation with DR. This implies that organizations with high DIS and low FM have better accountability, so they can obtain more donations. All of the characteristics have significantly association with DR. In specific control variab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expense variables and organization type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association with DR. On the contrary, revenue variables, age, and service price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association with DR.

The paper provides the evidences that DR will be influenced by DIS and FM. In addition, we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DR on NPOs and remind the managers of NPOs that high DIS and low FM are helpful for fund raising.

Keywords: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Financial Manipulation, Donations,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s

JEL Classification: C31, D83, L31, M41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and Chairman of NPOs Center,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Tel:(03)2655320, Email:clincycu@yahoo.com.tw; cllin@cycu.edu.tw.

** Accountant of The Directorate 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DGBAS), Executive Yuan.